

# 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为官僚主义画像

◆ 徐鸿武

## 毛泽东为官僚主义画像

1944年，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，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，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诗，用泥塑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。他说，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，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：一声不响，二目无光，三餐不食，四肢无力，



毛泽东

五官不正，六亲不靠，八面威风，久坐不动，十分无用！意思是说，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，养尊处优，闭目塞听，脱离群众。毛泽东以形象生动、幽默风趣的语言，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形象特征。

## 周恩来为官僚主义画像

1963年，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

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，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，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：

第一种，高高在上，孤陋寡闻，不调查研究，不抓具体政策，不做政治思想工作。这是脱离领导、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。

第二种，狂妄自大，骄傲自满；主观片面，粗枝大叶；不抓业务，空谈政治；不听人言，蛮横专断；不顾实际，胡乱指挥。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。

第三种，从早到晚，忙忙碌碌，一年到头，辛辛苦苦；对事情没有调查，对人员没有考察；发言无准备，工作无计划；既不研究政策，又不依靠群众，盲目单干，不辨方向。这是无头脑的、迷失方向的、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。

第四种，官气熏天，不可向迳；唯我独尊，使人望而生畏；颐指气使，不以平等待人；作风粗暴，动辄破口骂人。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。

第五种，不学无术，耻于下问；浮夸谎报，瞒哄中央；弄虚作假，文过饰非；功则归己，过则归人。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。

第六种，遇事推诿，怕负责任；承担任务，讨价还价；办事拖拉，长期不决；麻木不仁，失掉警惕。这是

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。

第七种，遇事敷衍，与人无争；老于世故，巧于应付；上捧下拉，面面俱圆。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。

第八种，学政治不成，钻业务不进；语言无味，领导无方；尸位素餐，滥竽充数。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。

第九种，糊糊涂涂，混混沌沌，人云亦云，得过且过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；一问三不知，一曝十日寒。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种，文件要人代读，边听边睡，不看就批，错了怪人，对事情心中无数，又不愿跟人商量，推来推去，不了了之；对上则支支吾吾，唯唯诺诺，对下则不懂装懂，指手划脚，对同级则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。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一种，机构庞杂，人浮于事，重床叠屋，团团转转，人多事乱，不务正业，浪费资财，破坏制度。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二种，指示多，不看；报告多，不批；表报多，不用；会议多，不传；来往多，不谈。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三种，图享受，怕艰苦；好伸手，走后门；一人做官，全家享福，

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；请客送礼，置装添私；苦乐不均，内外不一。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四种，“官”越做越大，脾气越来越坏，生活要求越来越高，房子越来越好。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五种，假公济私，移私作公；监守自盗，执法犯法；多吃多占，不退不还。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六种，伸手向党要名誉，要地位，不给还不满意；对工作挑肥拣瘦，对待遇斤斤计较。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七种，多头领导，互不团结；政出多门，工作散乱；互相排挤，上下隔阂；既不集中，也无民主。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八种，目无组织，任用私人，结党营私，互相包庇；封建关系，派别利益。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。

第十九种，革命意志衰退，政治



邓小平

生活退化。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。

第二十种，助长歪风邪气，纵容坏人坏事；打击报复，违法乱纪，压制民主，欺凌群众。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。

周恩来对二十种官僚主义的概括和剖析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，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。

### 邓小平为官僚主义画像

1980年8月，邓小平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一文中指出：

“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，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：高高在上，滥用权力，脱离实际，脱离群众，好摆门面，好说空话，思想僵化，墨守陈规，机构臃肿，人浮于事，办事拖拉，不讲效率，不负责任，不守信用，公文旅行，互相推诿，以至官气十足，动辄训人，打击报复，压制民主，欺上瞒下，专横跋扈，徇私行贿，贪赃枉法，等等。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，邓小平不仅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概括，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，强调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。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，特别是通过这一改革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○

(本刊编辑部摘自《学习时报》)

(上接第48页)也是该书一奇。

《赤色中华》的补充部分是《红军阔步前行》。这部分选录1934年7月6日在《国际新闻通信》中发表的一篇文章，以及《纽约时报》记者Hankow于同年6月2日在中国写的报道，记述中国红军在反击由德国将军和总参谋部官员训练、指挥的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中，取得的“新的、伟大的胜利”。这部分内容不多，但有两个看点：

一是突出表现了作为“红军之父”的朱德，在领导、指挥红军反“围剿”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。《国际新闻通信》中一文写道：“中国红军在中央地区的行动由朱德将军指挥。朱德是中国革命军队中最伟大的红军司令，

他最早在德国接受过军事训练，之后加入到中国革命者的行列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在对抗那些法西斯将军的战术方面，他表现得像一个大师。”这是将近80年前，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的朱德形象。真是久违啊。

另一个看点是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（抑或《赤色中华》编者）在宣传由中国工人、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同时，还不忘指出：“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民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结束了。”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在联手镇压革命，所以中国工人农民、中国革命军队“急需所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”，“等待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速援，这也是他们受

之无愧的”。

无须多说，这种借助外媒以印证和补充毛泽东报告的做法，显然又是该书一奇。

最后，书末附有一则广告，用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补充”一语作提示，推出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》一书（马丁劳伦斯普及本）。广告语写道：“准确介绍中华苏维埃，它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，甚至更多。在新闻里，他们常常被妖魔化。这里有他们真正的法律和目標。”这也算该书一奇吧。

总而言之，《赤色中华》确实是一本值得深入研究、广为宣传的奇书，一份历久弥新的历史性文献。○

责任编辑 冷波